

对泛道德化批判之批判

李嘉谊^{*}

〔摘要〕 泛道德化批判是将一切现象道德化后再用理想化、双重化的标准进行道德评判的一种批判方式。对主体和现象的过度抽象是泛道德化批判的逻辑前提,过度抽象带来的非现实性与虚假性紧张导致个人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泛道德化批判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对泛道德化批判的扬弃既要肯定它的热情批判态度,又要摒弃抽象的思维方式,并自觉将科学的批判方式与热情的批判态度相结合。

〔关键词〕 泛道德化;抽象;批判之批判

我国正处于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的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①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从历史事实上看,官方或主流舆论对我国发展的成就及其前景展现出强烈的肯定与自信。另一方面,在社会中却悄然蔓延了一种消极的情绪,对我国发展前景呈现出悲观或怀疑主义的态势。后者的极端代表便是泛道德化批判。泛道德化批判是将一切现象道德化后再用理想化、双重化的标准进行道德评判的一种批判方式。^②从表面上看,泛道德化批判试图用一种绝对化的道德标准评判社会生活,将社会生活现象泛化与道德化,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性质;从本质上看,泛道德化批判又是一种忽略历史与现实、与唯物史观相抵触的抽象思维方式。这种抽象思维所带来的道德与非道德的虚假性紧张导致对社会现状和前景的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进而表现为道德沦丧论、政治审丑论、经济崩溃论、文化虚无论、社会生活黑暗论等。这些论调充斥着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削弱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逐渐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阻碍。因此,应对泛道德化批判的抽象逻辑前提及其逻辑结果进行批判,在避免陷入泛道德化批判思维误区的同时自觉将其扬弃,培养真正合理的科学批判观。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210096。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坚定‘三个自信’与泛道德化批判哲学思维制约研究”(15BKS014)阶段性成果。

①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5月5日。

②黄明理、杨斌:《马克思主义批判观与泛道德化批判的反思》,《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一、对泛道德化批判逻辑前提之批判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批判应是科学批判与价值批判的统一,所谓批判的科学性即是指批判应当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否则多么强烈的批判也会与现实生活无涉,不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学问。批判的价值性表现在批判的出发点是否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上,马克思正是秉持着解放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使它脱离于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不沦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的某一流派为现实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青年马克思曾对鲍威尔等人“以漫画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①进行过深刻与细致的批判。他认为这种思辨形式将一切社会现实都进行过度的抽象化,当讨论人的时候,人所处的情境性都被抽去了,人成为了“抽象的东西”即观念、精神等等。批判成为对抽象的批判,从而失去了批判的革命性。与此相似,泛道德化批判也陷入了“思辨”的逻辑之中,它以对行为主体以及现象的双重抽象作为前提,但它在对现象进行批判时却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对这一前提进行了遮蔽。

(一) 对社会行为主体的过度抽象

首先,泛道德化批判对人这一社会主体特征进行了过度抽象。在马克思主义人学中,人的特征至少包含两个内涵:第一,人不是单一特征的生物,将人抽象成单一特征往往会导致分析的庸俗化:现代西方经济学正是将人视为单一特征的经济人或消费主体,使得它们“与对现实经济关系的本质分析的思路越来越远,而越来越局限于对供应、消费、需求领域的经济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分析和说明”^②。第二,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的类本质思想。在批判蒲鲁东将竞争当作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时,马克思便指出应当将人的特征理解成一个随着不同历史阶段而不断变化的生成性概念,而非一个既定的、永恒不变的概念,“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③泛道德化批判先行地将人的多种特征单一化为道德特征,这背后实际隐藏着抽象的形而上学类本质思想。例如,将小悦悦事件中18位路人的“旁观现象”的根源归结为他们的道德败坏,甚至归结为中国人人性丑陋。但细想之,这一结论的理所当然前提是道德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是人行动的唯一依据,这种前提明显显过于极端与理想主义。更进一步,这种抽象式的思维导致了人与特征地位的易位:人的主体地位仿佛发生了“异化”,本来应当因人存在的道德成为了人全部特性的主宰,人被这种抽象思维所统治。正如马克思批判布鲁诺所指出的:“先前,群众性看来或多或少是被批判的多种对象和多种人物的特性;现在,多种对象和多种人物却变成了‘群众’,而‘群众’则变成了一种对象和一种人物”^④。

其次,泛道德化批判还将行为主体的认识或行为结构进行过度抽象。社会现象总是与人这一行为主体有涉的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总是人对社会现象的理解。无论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抑或是海德格尔理解的前结构都向我们揭示了在主体行为产生之前已存在对事物的看法。这启示我们在对人行行为分析之前需要对这些先入之见进行考察。不可否认的是,行为的产生具有自觉与不自觉因素,人的先天认识结构与各种诸如时代精神、文化习俗等不自觉因素都能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影响,因为人本身就是历史与社会环境中的存在。当“彭宇案”被媒体们不断放大,各种类似案例被不断曝光时,人们便会对施行扶老人这一道德行为心存疑虑。这就不自觉地在人们心中产生一个悖论:当行动关系到个人利益时候,是否他人利益便高于个人利益,自利行为就等同于不道德的自利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3页。

② 孙伯鍨、张一兵:《走进马克思》,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3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83页。

为?一些学者在对当代大学生道德问题的原因分析时,将“大学生素质不尽如意”当作“众所周知”,将73.3%的大学生选择经济因素当作择业的主要因素看作是“急功近利”^①,他们又是否应该对诸如像“素质不尽如意”=“众所周知”,“利益”=“急功近利”这些“理所当然”的前提先行进行反思,甚至对他们之所以出现这种意识的根源进行澄清呢?最后,泛道德化批判在对行为主体过度抽象化的基础上又对其进行泛化,导致社会群体或整体的抽象化。一方面,整体被以偏概全式地为部分所替代,部分成为了整体的代表。另一方面,群体的整体性特征被群体的部分性特征所替代,整体性的特征被抽象化了。

(二) 对社会现象本身的过度抽象

泛道德化批判在对现象的批判中也存在着过度抽象。主要表现在:

首先,它在没有甄别伦理现象与非伦理现象的基础上,神目观式地将一切现象伦理化,并在此基础上取消了现象的情境性。对于伦理现象可以进行道德批判,但对于非伦理现象,却不能简单用道德批判,只有结合其他批判手段(如,政治批判、制度批判等),才能解决问题。再者,情境性的考察向来都是甄别道德现象的重点。道德现象指的是人类现实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用善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一类社会现象^②,能否进行善恶评价是衡量一个现象是否为道德现象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一个行为的善恶评价又需要先行对三个问题进行回答:第一,这个行为是否与行为主体的利益相关,对社会有利害性;第二,行为主体是否对这一行为结果的好坏有自知性;第三,这个行为是否是行为主体的自我选择行为。对以上每个问题的考察都须依赖于主体所处的情境性,泛道德化批判肆意抽象掉了道德现象的情境性,将由多种颜色所构成的生活抽象成了灰色,这明显过于简单和暴力。

其次,在探寻问题的根源上,泛道德化批判的寻根问底式分析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上,并没有继续深入询问这种道德问题出现的根源,从而将现象的根源抽象化。马克思认为这种道德上的原因以及肤浅的道德批判根本不能解释现实。在对“绝对的批判”进行批判时,马克思对此进行过深入的批判:“……因为批判把群众规定为只是精神的‘对立面’只是精神的空虚,只是精神空虚的更详细的定义,也就是‘懒惰’、‘肤浅’、‘自满’。绝对的批判不去追溯精神的空虚、懒惰、肤浅和自满的根源,而是从道德上严加谴责。”^③事实上,我们时刻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中存在的“断裂”:一方面,它能寻根问底式地将社会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归结为道德问题。另一方面,它这种寻根问底式却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上,并没有继续询问道德问题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最后,泛道德化批判仅仅将社会现象当作一种僵死的、独立于社会关系存在的单独客体,并没有将其当作关系来理解,从而不可能揭示出现象背后所具有的真正必然性。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现象从来不是僵死的客体,物与社会现象背后实际隐藏着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在对现象进行分析时,需要先行对它们进行揭示,“经验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④。有论者认为,小悦悦的悲剧源于18位路人的不道德旁观,似乎这18位路人伸出援手便能避免类似悲剧发生,但事实上,小悦悦悲剧背后不仅仅只有18位路人的匆匆,还有父母因忙于生计而无暇照顾孩子、过行车辆行驶的不注意、监控的失力,这背后隐藏的可能是劳动时间对人的过分占有、交通制度和监管制度的不合理等。

①张立军:《当代大学生道德问题的原因分析与对策思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7期。

②罗国杰:《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9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

二、对泛道德化批判逻辑结果之批判

泛道德化批判逻辑结果是基于抽象逻辑的泛道德化批判,因而它具有非现实性。首先,泛道德化批判所讲的道德具有非现实性,它先验性地规定了道德具有超历史与超情境性的特点,并用一种理想主义的高标准审视社会。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时间上,道德都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下人们的实践活动与日常交往方式中产生,这就决定了道德必然具有历史性与情境性,道德始终都是派生与第二性的,“以‘道德的’形式存在而论,它们始终是派生的,第二性的,决不是第一性的”^①。道德的祛情境性与超情境性不同,祛情境性是道德上升为道德规范的必要步骤,从道德规范再到现实生活,道德规范又需要重新经历一个情境化的过程。与此相反,超情境性的道德忽略了这些步骤,试图以一种普遍、绝对的理想主义道德规范生活。其次,泛道德化批判本身作为一种批判并不具有现实性。批判的现实性主要指批判的批判性以及价值性,马克思指出,批判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种手段。批判功能并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要在批判中发现新世界,为“改变世界”作出准备,但无论是“解释世界”还是“改变世界”都是以现实性为基础的。马克思批判了这样一种“技艺”：“即把存在于我身外的现实的、客观的链条转变成纯观念的、纯主观的、只存在于我身内的链条,因为也就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但是这种批判实质上对现实的改变并无任何帮助,因为“现实的、感性的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②。泛道德化批判重复着这种技艺,它将现实的冲突道德化后转变为在思想领域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在现实中,光是道德上的谴责却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有论者也许会质疑:难道道德谴责对于现实改变毫无作用吗?马克思早已向我们揭示:外化的产物应当以外在方式同它们进行斗争,道德谴责要想成为现实的力量,就必须先要成为物质的力量,“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③。要掌握群众首先需要说服群众,即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但泛道德化批判本身所存在的人的抽象使它并不具备这样的力量。

泛道德化批判逻辑结果是泛道德化批判刻意制造道德与不道德、应然与实然之间的虚假性紧张。道德与不道德、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对立转化为道德与“现实”的对立,这种虚假对立理所当然的逻辑结果是对社会现象的否定性评价。它的逻辑是:当讨论社会现象时,先将社会现象归结为道德问题,在不自觉中设立了道德与不道德之间的两极对立,既然道德的标准仅仅存在于自己的意识当中,那么自身便成为了“现实”的合理性评价者。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泛道德化批判中存在的颠倒:仿佛事物的特征并非由于它本身存在而存在,相反,它是由于它的特征本身而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能看到的“贴标签”现象,它背后只不过是一些虚假的对立,如,将“经商=自私”(仇富现象),将“为官=腐败”(仇官现象),将“教授发声=冷血言论”(砖家、叫兽现象)等等,且不论如何能先验地从逻辑上将自私、腐败、冷血加之于商人、官员与学者们身上,单是在现实中屡见不鲜的是商人做慈善、清廉自守的官员与学者走遍山区农村调研的案例就足以对这种虚假的对立进行驳斥。

泛道德化批判在学术领域中还表现为目的论:道德与不道德的虚假性区分对于它来说变成一种方便论证的手段。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论证中重复着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对于现象出现的原因采取泛道德化批判的态度,将现象根源归结为道德问题;另一方面,对这种社会现象或问题的解决诉诸于制度与法规。这种论证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它们之中却遵循着两种不同的逻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页。

如果说道德缺失是现象出现的根源,那么现象的解决应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又为何诉诸于制度的解决呢?如果说制度的解决有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我们又为何将道德而不是制度作为社会现象出现的根源呢?

泛道德化批判逻辑结果是非现实性与虚假性紧张造成个人与现实社会的疏离。泛道德化批判的非现实性及其刻意制造的虚假性紧张必然导致两种消极的处世态度:个人要是以为现实应与他想象中的一般如其所是,以一种理想主义与唯我独“真”的独裁者态度要求现实要与其想象相符,在不自觉的自欺中变得愤世嫉俗;要是便以为现实如表象中那样是其所是,道德与现实之间的对立不可避免,以犬儒主义式的消极态度看待社会。殊不知在迷恋于道德批判“深邃”的同时,也加深了自己与他人的隔阂。他们“一方面,面对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难以抑制强烈的道德批判冲动;另一方面,又痛感自己的道德批判话语无人问津”^①。这一困境势必增添个人对社会道德的焦虑,从而造成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不信任。

三、对泛道德化批判之超越

当然,应该看到,泛道德化批判的产生具有自身的必然性。这是因为:第一,从社会发展规律上看,我国的社会形态已经完成了从“人的依赖关系”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过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阶段,现阶段下公民的个人权利意识与私人生活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承认,人们物质生活的提升必然引起在精神上的追求,这便导致了一种矛盾:一方面,传统以伦理为本的道德体系开始分化,人们迫切要求尊重各个领域、甚至是个体的道德独立性,自己期盼成为自身的立法者;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后果之一是人的异化,在人追逐物质利益的同时可能导致道德的普遍虚无,在这种新旧道德的不衔接、甚至道德空场的情况下,人们又迫切需要一种道德准则来约束或者规范社会行为。如果说传统的泛道德化思维是维持国家、社会或者家庭的需要,那么现代的泛道德化批判的产生则是由于社会的现代化与传统社会道德之间的矛盾,这是人们之所以要泛道德化批判的潜在原因。第二,从意识形式的规律上看,人们的思维受到传统儒家德性论的影响。儒家德性论是一种泛道德文化,这种道德化衍射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在政治上表现为“政治道德化”、在法制上表现为“法律道德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道德化”、在艺术上表现为“艺术道德化”^②。受到这种传统德性论影响,人们对社会现象看法上难免带有以道德批判优先的倾向,这是泛道德化批判对社会现象进行“道德化”的历史文化根源。第三,从我国社会思维发展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思维在我国受到广泛推崇,但在启蒙与传播中存在着对科学与技术理性的片面崇尚与对人文精神的反思不足的现象,这就使得一种非历史的、抽象的、旁观者式的还原论思维在蔓延:似乎只要在对现象进行过度抽象之后,总能寻找出一个终极根源来对一切现象进行解释,其实这种思维在深层次上只是理想主义的万能论。

所以,基于上述,泛道德化批判的抽象性思维必须被扬弃。马克思区分了两种存在:一种是“想象中的存在”,另一种是“现实的存在”。在马克思语境中,“想象中的存在”只是抽象的观念与阴影的王国,是“单纯主观方面的需要、激情和愿望”^③。当这种想象中的存在无助于现实的改变时,它就沦为一种失去生命力的存在,这种失去生命力的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又是应被剔除的。泛道德化批判的抽象思

^①黄明理:《泛道德化批判论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2期。

^②李爱良:《论儒家文化的泛道德性》,《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③俞吾金:《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维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失去了生命力：

第一，就这种思维方式而言，它自身不具备反思性与价值性。正如前所述，由于它自身的理想主义以及对现实的虚假性反映，它并不能外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第二，这种抽象式批判极易误导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众所周知，个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在社会中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又需要以个人对社会的正确与积极的理解为前提。泛道德化批判者在“迷恋”于自身批判的“深邃”同时，失去了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能力，从而失去自我发展的能力。另外，这种抽象式思维总是先入为主地误导人们对现实的判断。经过泛道德化批判处理的现实总是一波三折，活似一部悬疑大剧：如，郑州大学生的掏鸟案，先是以道德批判态度批判法官的不公平判决，然而事情发生大逆转后，转而批判那位郑州大学生；再如，前段时间的哈尔滨“天价鱼”事件更是一波三折，一时间是店家说谎还是游客不诚实竟然说不明白，各种证据出炉指证店家或游客是诚实无辜，但是舆论却对两者都进行了道德批判。泛道德化批判总是执着于表象却不去探索现象的真实性以及现象背后真正的本质的批判，造就了它本身不可克服的盲目性与浅表性。

第三，这种抽象式思维所带来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无益于社会和谐和稳定发展。一方面，道德被摆置成了高高在上的神圣标准，不再充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润滑剂，成为人与人之间阻隔着一堵大墙。另一方面，消极的泛道德化批判助长了社会中的悲观主义以及怀疑主义，使得社会变得死气沉沉，从而阻碍社会积极的发展。激进的泛道德化批判又追求一种对现实爆发式的变革，这种思维受到西方敌对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变得仇视社会，甚至威胁着我国社会的稳定以及意识形态安全。

那么，如何克服泛道德化批判的抽象性思维呢？笔者认为，应对现象批判的热情与科学的批判方式结合。首先，需要肯定泛道德化批判的热情批判态度，并让这种批判态度与科学批判的思维方式相互结合。马克思认为批判既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又需要热情的批判态度，“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①。从这方面讲，热情的批判态度既是对自身批判科学性的自信，又是自身与他人价值立场的决裂。这种热情包含了两方面的情感，既包含了对旧的或腐朽的事物的愤怒，“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②，同时也包含了对未来的期盼，“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③。但如果空有批判的热情，批判本身便沦为了由情感所驱使的泄愤工具，谈不上成为现实的解剖刀以及改变现实的武器。其次，应自觉培养辩证的思维方式以替代抽象的思维方式。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但这里所指的抽象并非是无条件的、超历史的、消除了主客体的泛道德化批判式的过度抽象。相反，在马克思那里，即使是商品这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为抽象的范畴，它也反映着社会联系和规定，并蕴含着使用价值与价值这一对矛盾关系。^④再者，这种思维方式所遵循的路径与泛道德化批判的抽象性思维完全不同，后者的思维路径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抽象。这种抽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从表象出发解释表象，其必然的逻辑结果非但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反而承认表象，并为这种表象找到合理性依据。再次，应自觉将批判视角从道德评价优位转向历史评价优位。历史评价优位并不意味着消解了道德评价，而是以历史评价为基础，道德评价为辅，自觉将两种评价结合。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批判中，马克思曾经历过由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的态度转变^⑤：从道德评价优先的视角看，异化现象始终是作为一种消极的、应从道德上加以谴责的现象存在；从历史评价优先的视角看，异化现象在历史上的出现具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④孙伯鍈、张一兵：《走进马克思》，第499—500页。

⑤见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有客观必然性,应该从历史评价的维度上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历史评价的要义在于对社会现象应以对实在历史的正确解读为出发点,在方法论上应“从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出发,去阐明这些现象何以在历史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上成为可能”^①。在这种历史评价态度中,对现象的批判不再是面对现象“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而是自觉从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关系出发,揭示现象出现的真正原因,它并不以个人或事例当作批判的出发点,更不要个人对它们负责,“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②。马克思曾站在历史评价的角度上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③,又站在道德评价的角度上批判“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④。泛道德化批判的缺陷在于它以超现实的“应然”理想方式直面现实,往往与现实格格不入。历史评价包含了“实然”与“应然”两个维度,要求在揭示现实不合理的同时,要自觉站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立场上对这种不合理进行道德批判,只有在历史评价优先的态度中,道德批判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总之,对泛道德化批判不能全盘否定。泛道德化批判在我国的盛行有其必然与合理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民对社会现象的关注以及对新秩序的追求。但与此同时,蕴含在泛道德化批判中的抽象思维方式给个人、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我们需要自觉扬弃泛道德化批判,将科学批判与道德批判相结合,确立正确合理的批判观。

(责任编辑:杨嵘均)

A Critique of Pan-Moralistic Criticism

LI Jia-yi

Abstract: Pan-moralistic criticism is an approach that gets everything moralized and idealized before morally judging it with double standards. The premise of pan-moralistic criticism is over-abstraction of the subjects and their actions. The unreality and illusory fear deriving from such over-abstraction will cause pessimistic negative emotions. Inevitable and rational as it is, the pan-moralistic criticism should be improved by keeping its passion for doing criticism while abandoning its abstract way of thinking; that is, the passion should be deliberately guided by a kind of rational and scientific criticism.

Key words: pan-morality; abstraction; critique of criticism

① 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